

杨向奎 著

清儒学案新编

三

齐鲁书社

杨向奎 著

清儒学案新编

三

齐鲁书社



鲁新登字07号

封面题字：蒋维崧

责任编辑：刘志义

封面设计：王悦玉

版式设计：宋 悌

清 儒 学 案 新 编

（第三卷）

杨向奎 著
冒怀辛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9.875印张 5 插页 443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267—2

B·60 定价：21.00元

《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目录

(一) 马 驂	《宛斯学案》	1
(二) 方 苞	《望溪学案》	29
(三) 顾栋高	《震沧学案》	83
(四) 惠周惕、惠士奇、惠栋	《三惠学案》	106
(五) 曹铨、曹寅、曹霭	《浃阳学案》	177
(六) 施闰章	《愚山学案》	340
(七) 臧玉林	《玉林学案》	385
(八) 李因笃	《天生学案》	417
(九) 彭定求	《南畝学案》	471
彭绍升	《二林学案》	471
(十) 李 绂	《穆堂学案》	547

马骥 《宛斯学案》

杨向奎稿

马骥（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生——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卒）字骥御，又字宛斯，山东邹平人。曾中进士，官知县，宰灵璧时，商民正饱受“杂顶”税制剥夺之苦。这些项目“多属前项未清，后项复起，百姓终岁烦苦，无有宁息之日”者，以致农商各界失业破产，流离失所。宛斯到后，“蠲灾荒，除陋弊，刻石县门，岁省民力无算，流民复业者数千家。”

（参考罗仲辉《马骥》引光绪年《凤阳府志》卷17）

马宛斯不仅良吏，且为治史名家，曾辑有《左传事纬》十二卷，共一百八篇。盖《春秋三传》各有短长，《左传》长于记事，且文字流畅，富丽堂皇，在古代记事文学中无疑空前，后亦少有。《公羊》长于义法，议论宏伟，目光如炬，在历史哲学中彪炳千古。《谷梁》谨严，虽记事不如《左传》，义法不如《公羊》，而谨严规矩，不泛不滥，自有风范。但《三传》依《春秋》编年，编年史记历史发展源流，以时为纲，而事事间隔，未免顾此失彼，欲窥史事全豹，穷历史面貌之首尾者唯《纪事本末》。《左传事纬》为纪事本末体，在《左传事纬例略》中，指出：

旧文传丽于经，年时月日，以相系维也。易《编年》

为叙事，篇目一百有八，将令读者一览即解，且无遗忘之病。

纪传体以人为纲，编年体以时为纲，即以历史丽属于人或时代，欲窥一事之首尾者，遂取丽人丽时之事为一编，是为以事为纲。史有三纲，尽于此矣。《纪事本末》依史书归纳有关史料而成书，不必自原始史料之剪裁起，但拟定题目之工作亦难。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于千头万绪之史实中，何去何取，颇费斟酌。《左传事纬》之选题，尚差强人意，但非无可议处，如有《文姜之乱》而无《管仲治国》。孔子曾许管仲以“仁”，而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盖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之不绝若线。桓公得管仲，乃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桓公霸业，管仲之力，仅有桓公之霸，而无管仲之治，是为失当。《事纬》于桓公霸业之评论，亦仅及：

东迁之后，起自危难，首起图功，可谓伟矣。……煮海通贾，国用富强，衣裳兵车之会，大率尊天子而示信义，使有圣王在上，必且假以方伯之命，使之长帅诸侯，惜也王纪不立，经营徒劳，桓之为此，亦极难耳。（《左传事纬》卷二《桓公霸业》）

以上虽肯定桓公霸业，但于桓公霸业之深远意义，无所涉及。盖宗周一统，固划时代之大事，但非秦汉以后之中央集权国家，乃诸侯国间之联盟，以周天子为“纲”，诸侯为“目”，纲目之间，尊卑之分，但侯国与天朝乃大宗小宗间之亲属关系，年代愈远，关系愈殊，诸侯愈强，周天子愈弱，于是尊卑之关系，依力量之大小而反转。周天子不复是维系一统之中心力量，纲不为纲，目不为目，“王纲坠”矣。而“一统”徒存虚名。且少数民族崛起，问鼎中原，夏商以来之传统文明，以华夏族为

主体之周王朝，呈土崩瓦解之势，于此而齐桓公出，“尊王攘夷”之真实含义，当为维护华夏之传统文明。于此《公羊》义颇不俗，不以民族成分，分夷狄与中国，而以具文明社会者为中国，否则为夷狄。此盖孔子之传统学说，所谓“微管仲，被发左衽”，亦即无管仲则失去灿烂之传统文明，故齐桓霸业为可贵。而且西周一统虽不似后来之“大一统”，但西周一统在促进文化发展及民族融合方面均起积极作用，霸业衰，无复强大之中心力量存在，纷争扰攘，长时不休，遂至战国。

但在战国之纷争扰攘中，强陵弱，众暴寡，更酝酿新的一统，华夏之传统文明，将具有新的特色。此后在民族构成上华夏族变为汉族，汉族乃先秦各族之融合体，以华夏文明为中心，汉族文明更具有多民族文明融合之特色，即在故有文明之基础上加上新的血液。在变革期间，保守与创新力量，始终在斗争中，保守力量大，则社会发展迟滞，创新力量大，则社会发展快速。秦末项羽、刘邦亦即两者之代表人物，项羽胜则为战国之延长，刘邦胜则为灿烂之汉帝国。但以此种社会发展观念求之于马骥尚非其时也。

在《左传事纬》目前有左丘明《小传》，曾探讨《左传》之来源及其作者，其中有云：

或曰，丘明孔子以前贤人，孔子所引率前世人，如老彭伯夷之类。又《左传》、《国语》属缀不伦，似非一人所为，传《春秋》者，疑楚人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特详，多无经之传，此其证也。其说颇乖异，不可考据。夫孔子所称渊骞之流，岂非及门之士。马迁谓鲁君子左丘明作传，又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且内外传杂采异文，若齐晋大国，亦皆有无经之传，何必楚人之所作哉。

自左氏既没二百余年，经既遭焚，书亦燬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定《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左氏传》大好之，引传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氏》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于太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中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立学官，自此以后，《左氏》显而《二传》微矣。今观《左氏》一书，条例文辞，无不灿然明备，而《公》《谷》穿凿，往往自生牴牾，优劣昭然，奈何汉儒聚讼纷纷，久而不定，岂古文之隐显有时，圣贤之大业，谅亦终不可晦尔。

马氏此论牵涉到中国经学史核心问题，即《左氏》《周官》之真伪问题。此所谓“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左氏传》大好之，引传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正好为刘歆窜改古文经之罪状，盖宛斯朴学，尚未能究今古学派之源流。当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时，即引起执政大臣及群儒之不满，事具《汉书·刘歆传》，当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后，“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

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求，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是知歆为学术，遭反对而牺牲，千载而后，平情而论，当服其远见，乃因其政治生活，遭逢莽篡，而王莽标榜周公。于是今文经学家乃谓《周礼》伪自刘歆，以附合莽篡者，歆又遍伪群经以为佐证，而《左传》为其首要；以《周礼》《左传》为伪书，刘歆之罪不容诛矣！清末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遂云：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籍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见原书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于是王莽刘歆二人，一篡汉室，一篡孔学，刘歆之罪尤甚于莽，因新室不久即亡，而歆经大行，影响后世千百年。哀帝时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虽遭贬斥，但其后不久，平帝时诸经终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云：“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其后诸经虽屡立屡废，但古文经之学者渐多，《左氏》亦日见得势，下迄六朝，《春秋》学为《左氏》之一统，《隋书·经籍志》始叹《公》、《谷》之垂绝。唐代刘知几《史通》中《申左》，盛倡《左氏》三长，《二传》五短之说。近代《左氏》，由于古文学者之鼓吹，盛行于世，但今文经学因常州学派之兴起更

大行于世，晚清时代，变法维新之说起，遂家家今文，户户《公羊》矣。康有为即以《公羊》起家，三世之说流行于世，今文学派亦非可厚诬者。盖今文古文各有千秋，仓促之间难论其短长也。

马氏为历史家，在《左传事纬》外，又有《绎史》一书，共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计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计二十篇；三曰《春秋》鲁十二公时代历史，计七十篇；四曰《战国》至秦亡，计五十篇；五曰《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等计十篇，合一百六十篇，卷秩浩繁。江藩《汉学师承记》称之曰：

其书最精，时人称为马三代。顾炎武读是书叹曰：“必传之作也”。（卷一《马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中亦加肯定，以为：“征引浩博、考证精详”。其实浩博有之，精详则未也。古代史料，尤其在阶级社会前，无史官记录，史事出于神巫之记诵，体裁多为史诗，史诗中史多为神人不分，神话与历史混而为一，现存《诗经》及《楚辞》中尚有史诗之遗风，神人不分，后来治史者于此必须有所断制，何者为神，何者为人。司马迁《史记》断自五帝，遗却三皇，实属卓识。而马驥《绎史》起自开天辟地，这是从《创世纪》开始。在《绎史》开端引《列子》及《淮南子》中有关论述，如《淮南子·天文训》云：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漉漉，故曰大昭。道始于虚霁，虚霁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汉垠，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创世纪》而没有假乎于上帝，是为中国哲学源流中的特色，

但宇宙历史仍与人类历史相去甚远，马骕叙中国古史而以此始，不亦迂且怪乎？而继叙盘古，引《真源赋》云：

盘古氏后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时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万八千余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

以下又多引讖纬书，语多荒诞。盖史诗中之人神不分，乃源于先人对事物之不了解，遂以人为神，或以神为人，神也只能是自然现象而未被认识者。有此误解，遂致人神合而并入史诗中，有误解而无伪造，此乃史诗之可贵处。若后来神仙家言与图讖书，乃出于方士之创造，无根据仅凭想像而入史。宛斯于此两者都似无力鉴别，以之入史，未免使人茫然。宛斯于《开辟原始》目后论曰：

自迁之书出，遂令言三皇者，欲备其数而不得，则纷然聚讼，或曰燧人，或曰女娲，或曰祝融矣。夫迁之所本者《帝系》与《世本》也。然而《帝系》、《世本》或出于周末，采录固有不可依据者……是岂可尽信乎？且迁之所记往往乖刺疑误，……。《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书，今三皇之书泯阙，五帝仅存《二典》，《易》取庖牺氏以来，略举之而不悉，俾后世无所折衷，无怪乎人人异端牴牾，更仆未可问也。（《绎史》卷二）

宛斯而责太史公依据《世本》、《帝系》为不可信，且责其遗却三皇以致聚讼，故《绎史》遂多引杂书以图补救。其实宛斯责史公之所短正其谨慎视大体处。虽然，宛斯于中国古史传说中还还是有所判别，他说，“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于讖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民号，斯好奇者之过也，尚论者断自庖牺可矣。”（《绎史》卷一）史料断自《诗》、

《书》六艺，而史实断自庖牺，仍然是有所别择。但他在写作中还是杂采庞收，长处在于史料丰富，可供后人选择，短处是真伪不分，使人无所适从。如云《老子道教》中，杂引《神仙传》及《列仙传》，如引《列仙传》云：

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其有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食菖胜实，莫知其所终。

这种记载，对于研究老子者毫无用处。虽然化胡之说，为道徒所乐道而流传，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添一浪漫神奇的色彩！

总之《绎史》以其采择庞杂，未免为治史者所诟病，但以其丰实，真伪杂陈，有识之士，于其中亦有所得。《绎史》不止于上古，而止于秦灭六国及其灭亡。原书卷二十二有《周公摄政》一章，章末有论云：

武王灭殷七年而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摄位以听政，处危疑而不辞，未遑为身计也。既而四国流言，公居东以辟之，天诱其衷，成王感悟迎归，爰始东征，以靖殷乱。向使当日王疑不释，周公不归，东山之斧不破，殷孽之氛不除，骨肉之难作，疆场之变起，周室尚未向乎！……惟武周以仁义立武庚，故以诚信使三叔，不幸冲于嗣位，周公居内摄政，管叔乃从而间之。君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吾父嗣王之叔乎！此管叔之不肖也，而武庚实煽之，播流言以基王室。武庚眈其内难，以为殷绪可乘而复，三叔可闲而用，此武庚之愚也，而管叔实藉之同恶相济，讹言煽惑，淮夷徐奄，群起而附之矣。当其叛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复殷，必且激其顽民以中兴恢复之名，

而资之监为羽翼。管叔意在撼周，必且惑其国人以除恶君侧之说而借武庚为声援，淮夷徐奄，又意在取鲁，必且外张应殷之势，内窥新造之邦，而倚武庚三监为犄角，相挺而起，以乱助乱，同归于乱周而已。……

是以周公《大诰》，决策东征，……惟时鲁公誓师征淮，以离四国之党，而康叔守邦于卫，史称其扞禄父之难，四国所以不能长驱西指，旋就诛灭者，安知非康叔牵制之力哉。……乱既平矣，周室复宁。于是营洛作都，以成成王之意。……又考之书载《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虽所诰不同，大抵为殷人作也。读《泰誓》、《武成》见周之取殷甚易，及读《八诰》，又见周之安殷甚难。岂其紂虐方炽，民迫于膏火，故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乃徐思殷王之世泽而不能忘乎？……然考殷周之际，实有不尽然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当时殷之良民，未尝不服田力穡，安居说服，而顽嚚梗化者特喧豗酗酒逋逃奸宄之流，未服厥辜者耳。……周不忍轻杀，必欲使之变移归心而后止，不憚反复诰戒，此所以为忠厚之至也。周公之东征也，黜殷践奄，三年然后定，归而治官营济，诰告庶殷，盖曰不遑暇焉。……故周家之业，文王经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而先后辅翼之，则周公也。……

这是一篇精彩的史论，有史实，有分析，有论断。关于周公当时之处境，自古以来有三说，争论不决，三说是：

（一）周公摄政称王；

（二）周公摄政而未称王；

（三）周公未摄政亦未称王。

宛斯则言周公摄政，未道其称王。这应是恰当的论断。《周诰》中“王若曰”之“若曰”亦见于先秦子书，其意同于“诺曰”，乃当时人问答之词，“王若曰”之王即成王，非周公，故周公未称王。关于武庚、三监、东夷叛，宛斯分析三者之同床异梦，亦先当，武庚意在复殷，管叔意在闲周公而淮夷意在取鲁。三者乌合，遂构成大乱，实周初之大祸也。

宛斯于周初八诰，根据周初形势之分析，加以判断，亦正确。他说，“周公之东征也，黜殷践奄，三年然后定，归而治官营洛，诰告庶殷，盖曰不遑暇焉。……故周家之业，文王经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而先后辅翼之则周公也”。史实如此，评论正确，亦良史才也。

马氏尚有《十三代瑰书》，收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成丛书，未刊，后渐遗失。又有《邹平县志》，亦未见。誉之为清代古代史家及一渊博学者，可以当之无愧色。

《宛斯学案》学术思想史料选编

《绎史》卷一

《开辟原始》

阳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淮传道之。三复斯言，而知稽古之难信，考论者之无征也。夫二子者，生当周季，去古未远，而已叹古初之莫纪，矧百世以下，遭秦燔灭之余，而妄称上世之遗事，岂不亦迁诞哉。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万汇繁滋，民生总总，气禀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矣。第文字未兴，史官未设，伊昔之政教约束，固甚简略也，孰能默识传述，俾历世罔或失坠。然则盘古以上，谓无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谓尽可指数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寿之不齐，今犹古矣。黄帝在位百年，继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多历年所，顾不数见也。何独洪濛之辟，皆身历运会，抑尧舜齐圣，朱均不移，武周并生，管蔡用畔，高阳高辛氏之子，有才有不才矣。安得九头五龙，德皆神异，分理寰区，无或殒落，兄弟各一万八千岁哉。信如十纪之说，名不雅驯，荐绅之所难言，即所称二百二十六万余年分为十纪，则纪约二十余万年，因提六十八世，禅通九十余世，世当得三

千年，而一姓或止二三世，则是享年有永，祚世为不长也。疏乞始黄帝，以迄获麟，不过二千年耳，方之以前，修短不伦，忽焉与鲁史春秋同时绝笔，何其舛与。太古未尝无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垠圉，仲尼不能尽识。与夫管庄之所称道，戎夫之所训戒，倚相之所能读，或在书契以前，或经孔子删弃，是皆无裨于政治，罔资于问学者也。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纚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尚论者断自庖牺氏可矣。

《绎史》卷二

《皇王异说》

三皇五帝人之恒言也。《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故黄帝以上为三皇，少昊以下为五帝。五帝既没，三王继统，三王世衰，五霸递兴。是以论世者，必称三五，其来久矣。太史公作《五帝本纪》，首黄帝而无少昊氏，说者曰，少昊不居帝位，率鸟师以理西方，信然。则《月令》何以列少昊为金行之帝，郑子自述其祖，何得言继黄帝而立也。自迁之书出，遂令言三皇者，欲备其数而不得，则纷然聚讼，或曰燧人，或曰女娲，或曰祝融矣。夫迁之所本者《帝系》与《世本》也，然而《帝系》《世本》或出于周末，采录固有不可依据者，舜祖虞幕，见于《左氏》、《国语》者明甚，而脱漏失纪，是岂可尽信乎？且迁之所记，往往乖刺疑误，合重黎而为一，是楚有二祖也，齐为四岳之裔，又为伯翳之后，是齐亦有二祖也。以伯翳为皋陶之子，秦赵方方，何臧

孙有不祀之叹。伯翳佐禹治水，以驯服鸟兽，即《书》所谓“益作朕虞”，《孟子》所谓“使益掌火者矣”。史于本纪既两歧其名，于《世家》又分为二人，何其谬邪。故益之为翳，亦犹昊之为皐，伏羲之为宓戏，啻之为偁，纣之为受，与夫契之为离，垂之为姪，皋陶之为咎繇，仲虺之为儻，或为瞿，或为瞿，伯罔之为瞿，君牙之为雅，古文之通用类然，皆谓之二人可乎。

《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书，今三皇之书泯阙，五帝仅存《二典》，《易》叙庖羲氏以来，略举之而不悉，俾后世无所折衷，无怪乎人人异端牴牾，更仆未可问也。伯夷之作秩宗，《虞书》载之，而以为四岳，姜姓之祖。庭坚高阳氏之才子也，而以为咎繇之字。放勳重华文命，各言其德业也，而以为尧舜禹之名，尧舜名也，而谥法载之。若此者其皆信乎。共工氏与女媧争，任知刑以霸九域，而《列子》云，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是已有两共工矣。其作乱于帝啻之世，重黎诛之而不尽，与振滔洪水，舜流幽州者，又有两共工也。燧人之前有有巢氏，昊英之后，又有有巢氏，而皆教民居。禅通之帝为仓颉，黄帝之史为仓颉，而皆造书契。帝尧之时有羿，夏后太康之时有羿，而皆以善射名，若此者其尽然乎。信如《世纪》所称女媧祝融皆袭庖羲氏之号，而并称二皇，是一姓而再皇也。据邹子五德之运，五行相生以承其位也。燧人祝融皆以火德王，而与炎帝并称皇，是以火济火也。皇者美大难名，帝者克配上帝，王者贯通三才，其名不同，其实一也。皇神化而莫违，帝高居而不冒，王天下所归往，天佑之，民戴之，其德同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成，其时不同也，而功同。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五帝殊时不相沿乐，曰作曰述，或革或因，其政不同